

## 现代汉语普通名词作状语的句法语义接口研究\*

尹 明 花\*\*

### <目 次>

- |                     |                  |
|---------------------|------------------|
| I. 绪论               | IV. 普通名词作状语的制约因素 |
| II. 普通名词作状语的数量      | V. 结语            |
| III. 普通名词作状语的句法语义接口 |                  |

### I. 绪论

汉语传统语法认为普通名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充任主语、宾语和定语。其中时间和处所名词除具备普通名词的主要句法功能之外，还经常作状语，这已是学术界的一种共识。例如，“他下午去上海。”、“我们北京见。”中的“下午、北京”分别是时间名词和处所名词用作状语。但在实际言语材料<sup>1)</sup>中可以发现，除了时间和处所名词以外，也有部分普通名词充当状语。例如：

- (1) 尔后，老孙在西安又高价聘请了司机，弄得我给朋友无法交代，很没颜面。

\* 中国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英、汉、朝三语连接表达的语序类型学研究”(JJKH20200547SK)阶段性成果。

\*\* 延边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 讲师

1) 本文的语料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CCL)，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语料库(BCC)，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

- (2) 这是一件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内心信念的事情——遇有纠纷，法律解决。
- (3) 铁道部工务学习班在通县订报，先后到通县邮局去过四次，电话联系过三次，到北京本社来过两次，电话联系过两次。拖了十几天，但最后仍不能及时看到报纸。
- (4) 那好吧，我们立即广播找人，我们就知道这么几个乘客中不大可能有医生，结果还就是没有。
- (5) 上海一大学生煤气中毒，深昏迷39天后救治康复。

例(1)的“高价”、例(2)的“法律”、例(3)的“电话”、例(4)的“广播”、例(5)的“煤气”都是普通名词，在上述例文中均直接充任状语。

目前，对现代汉语普通名词能否充当状语，学界的看法不太一致。一种观点是认为普通名词不能做状语。如朱德熙(1982)指出：“就修饰语看，人称代词、名词、数量词(指数词和量词的组合)是典型的定语，这几类成分只能做定语，不能做状语<sup>2)</sup>。”他在《语法答问》里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个观点。吕叔湘(2002)认为由名词担任和由名词产生的状语有三类：①表示时间的名词；②表示时间、处所或引申意义的方位短语；③名词加“地<sup>3)</sup>”。对上述语料中出现的现象，没有出现“地”的，往往解释为介词省略。如孙德金(1995)援引《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的格系统，将状谓之间的语义关系分为11种：①时间+动形、②处所+动形、③方向+动形、④工具+动形、⑤材料+动形、⑥方式+动形、⑦范围+动形、⑧依据+动形、⑨数量+动形、⑩原因+动形、⑪目的+动形。他认为，上述深层语义组合模型在表层句法形式上表现为两种结构：名词构成的零格标形式与介宾短语构成的带格标形式。其中，零格标形式可视作介词的省略，因此无论是否带介词，句法分析时应该统一处理为介宾短语作状语，而不是名词直接作状语。针对“历史、逻辑、真情、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等名词需加“地”后才能做状语的现象，孙德金指出其本质是翻译造成的欧化现象。例如，英语通过形态变化将名词转化为副词(如“logic→logical→

2) 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41页。

3)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3-24页。

logically”),副词的形态标志为“-ly”，而汉语缺乏形态标记，翻译者将“-ly”对应为“地”，导致汉语中出现了少数名词加“地”做状语的现象。按照孙德金这种解释，“逻辑”与“逻辑地”应该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是名词(对应英语“logic”)，后者是副词(对应英语“logically”)。这样理解的话，汉语的普通名词也不能做状语。

另一种观点认为普通名词可以做状语。如李晋荃(1983)认为普通名词可以充当状语，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工具或材料等。刘慧清(2005)认为在句法分析中，不宜多用“省略”，把“掌声鼓励、电话联系、现场直播”等看作是名词做状语，而不是介宾短语做状语。黄伯荣、廖序东(2017)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六版)指出“可以直接修饰动词做状语的一般名词、动词是少数，限于能用来表示动作方式手段、状态的词<sup>4)</sup>，例如‘电话购票、笑脸迎人、公费出国留学、现金支付、现钱交易、现场直播’等”。

范晓(2004)认为语法研究应该区分三个不同的维度：句法维度、语义维度和语用维度。名词能不能充当状语属于句法维度，名词充当状语时表示什么样的格关系，属于语义维度。上述认为名词不能做状语的依据就在于零格标格式的名词做状语和带标格式的名词做状语表示相同的语法意义。如“电话联系”和“用电话联系”中的“电话”和“用电话”都表示工具，因为“用电话联系”的“用电话”是介宾短语做状语，“电话联系”的“电话”也是介词短语做状语，只不过介词为零形式。我们认为这里混淆了句法维度和语义维度，一个语言单位充当什么句法成分属于句法维度，一个语言单位在句法结构中承担什么语义角色属于语义维度，以语义维度为标准来框定句法成分，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同样的语言单位在句法结构中可以充当不同的语义角色。比如：“摔破了一个大碗”和“盛大碗”，前者的“大碗”是“受事”，是宾语，后者的“大碗”是“工具”，也是宾语，不能因为语义关系的不同把前者的“大碗”看成宾语，把后者的“大碗”看成状语。同样不同的语言单位，在句法结构中也可以承担相同的语法意义。例如“电话联系”和“用电话联系”的“电话”和“用电话”，都表示工具，但二

4)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六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70页。

者形式不同，一个是名词，一个是介词短语，但从句法关系看，二者都位于动词之前，都属于状语，前者是普通名词做状语，后者是介词短语做状语，只不过普通名词做状语的情况比较少见罢了，但它确实存在。因此，本文不赞同介词省略说，因为所谓的介词省略，实际上考虑的是格关系，格关系属于语义维度，不能用语义维度的分析代替句法维度的分析。本文赞同少部分普通名词可以直接做状语的观点，这种语言现象属于普通名词的非范畴化用法。

## II. 普通名词作状语的数量

目前，能够看到较为系统深入研究普通名词做状语的成果主要有三项：分别是李晋荃(1983)的《试谈非时地名词充当状语》，孙德金(1995)的《现代汉语名词做状语的考察》，刘慧清(2005)的《名词做状语及其相关特征分析》。在这三篇论文中，李晋荃没有考察普通名词做状语的数量；孙德金以国家汉办的《HSK词汇等级大纲》作为考察对象，对表中所列出的3892个名词逐个进行了功能考察，发现有60个普通名词可以做状语，占1.5%，具体清单如下：

暗中 反面 精神 全面 书写 协议 整体 暴力 高度 局部  
全力 顺序 义务 正面 背后 高温 科技 申请 团体 阴谋  
政治 本能 高压 口头 盛情 微观 友情 直线 表面 根本  
历史 荣幸 武力 原则 志愿 不分 规模 逻辑 实话 武装  
战术 重点 侧面 和平 内部 实况 现场 战略 低温 集体  
气功 事实 现金 掌声 动态 集团 曲线 手工 现钱 真心<sup>5)</sup>

孙德金(1995)在研究中明确限定了名词的讨论范畴，将时间词、处所词

5) 孙德金，〈现代汉语名词作状语的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1995，91页。

与方位词排除于研究对象之外,其依据在于这三类词语具有充当状语的句法功能。该研究聚焦的核心问题为普通名词作状语的语言现象,即仅针对不受上述三类词范畴约束的普通名词展开讨论。然而,通过对其所列举的60个名词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部分词语的归类存在范畴边界模糊的问题。如,“现场”、“内部(表空间义项时)”、“表面(表物理位置时)”等词,应划归处所词范畴;“背后”和“侧面”等具有方位指向性的词语,本质上属于方位词范畴;“书面”和“口头”是以属性限定为主要功能的区别词(亦称属性词)<sup>6)</sup>,其语法特征与普通名词存在本质差异。

刘慧清(2005)在孙德金(1995)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做状语的名词不仅仅只有60个,她又列举出134个,分别如下:

本科 博士 厂价 成本 初中 大班 大处 大脚 大碗 大学  
 大专 大字 刀刃 低调 低价 低息 底线 地主 电话 电视 动力  
 恶意 飞机 福利 富农 感情 干部 高价 高薪 高中 公费 公款  
 工人 好心 黄牌 火线 货币 红牌 机器 激光 激情 基因 集体  
 集团 技术 键盘 街头 精品 科班 科学 客场 冷水 冷眼 廉价  
 良心 两地 另眼 煤气 明码 明文 母乳 牛奶 农民 拼音 千金  
 亲情 全部 全程 全国 全景 全体 全天 全屏 肉眼 深情 实地  
 手球 手术 硕士 燧石 特价 头球 团伙 网络 网上 微观 卫星  
 文化 小班 小本 小车 小处 小学 笑脸 协议 刑事 胸部 严刑  
 演员 药物 意图 意气 义气 邮局 语言 原地 真空 真情 整体  
 政治 知识 职务 志愿 中农 中学 中专 重金 重拳 主场 专车  
 专科 专业 成本价 全方位 小角度 温开水 运动员 跳楼价 出厂价  
 优惠价 教练员 手 好言好语 白纸黑字<sup>7)</sup>

6) 区别词(亦称“属性词”)是汉语中一类只能作定语、表示事物属性的词,不能单独作谓语且不受程度副词修饰(如不能说“很书面”、“非常口头”)。“书面”和“口头”作为区别词,其常规用法是直接修饰名词(例如“书面材料”、“口头承诺”)。但在“合同以书面为准,口头无效”这种特殊句式中,“书面”与“口头”虽表层呈现名词化倾向,实际上是“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的省略形式。

7) 刘慧清,《名词作状语及其相关特征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2005,30页。

仔细考察刘慧清(2005)列出的这些普通名词,我们发现有些并不是普通名词。例如“大处、街头、两地、客场、实地、网上、小处、胸部、原地、主场”等应该是处所词,“刑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明确标注为属性词(区别词),有些词是兼类词,如“专业、低调”等,它们兼属形容词和名词,形容词可以做状语,如果这些词出现在状语位置上,很难断定它是名词做状语而不是形容词做状语,再说,有些名词在特定的格式中可以类推,很难进行列举。

句法上做状语不是普通名词的范畴功能,属于非范畴化用法,因此,普通名词做状语应该是少数。尽管如此,普通名词是个开放类,哪些名词能够做状语,哪些名词不能做状语,不可能进行精确地统计,只能对搜索到的语料进行统计,由于语料库的大小不同,得到真实语料的样本也会不同,因此,每次统计所得的数量很难相同,能够在类推格式中出现的名词更是无法统计,例如上文指出表示材料的名词就是如此,一个名词性成分只要在句法结构中充当材料语义角色,都可以出现在“名词 + 制作义动词 + 的 + 结果名词”的格式中。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玻璃做的鱼缸  
 石子铺设的小路  
 牛肉做的丸子  
 米粉做的豆腐  
 报纸糊的窗户  
 蜂蜜调制的饮料  
 人搭的梯子  
 麦秸编制的工艺品  
 红砖砌的墙头  
 ……

从理论上讲,能够充当材料语义角色的名词是开放的类,要想列出这类名词的清单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些语义角色没有出现的特定格式,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出现了一些具有相同功能的新事物,那么指称这些新事物的名词也会

出现类似的用法。例如：“电话”是我们较早看到的以工具角色出现的名词做状语的例子。如“咱们电话联系”，“我电话通知您”等等。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新的联络工具：如手机、微信、QQ等。那么这些词也可以组成“咱们手机联系”，“咱们微信联系”，“咱们QQ联系”，“我手机通知您”，“我微信通知您”，“我QQ通知您”等的句法形式。因此，我们认为很难列出普通名词做状语的清单，但可以对哪些普通名词有可能做状语进行一定的预测。

### Ⅲ. 普通名词作状语的句法语义接口

生成词库理论<sup>8)</sup>指出，语言意义具有组合性且是动态的，而词项意义则相对稳定。词项进入组合层面后，在语言生成机制作用下会自我调节意义，以契合语言组合要求，进而产生具体意义。状语用于修饰限制谓词性成分，在汉语里主要由副词或形容词充当。绝大多数普通名词不能出现在状语位置，仅有极少数可以，且这些能作状语和普通名词必定有修饰限制谓词性成分的语义基础，与谓词性成分语义相符，在语言生成机制作用下实现状语的句法功能。由于普通名词充当状语的语义角色不同，其与谓词性成分的语义组合也有所

8) 生成词库理论(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GLT)由美国计算语言学家James Pustejovsky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该理论突破了传统语义学的静态词义观(即词义固定不变)，转而主张词汇意义在句法组合中通过动态语义生成机制(dynamic sense generation)实现语境化建构。其核心创新在于对句法-语义接口动态性的阐释：句法结构对语义角色施加选择性约束，而词汇的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包括构成角色(Constitutive)、形式角色(Formal)、功用角色(Telic)与施成角色(Agentive)——通过类型强迫(Type Coercion)机制调整语义投射，以满足句法环境的语义适配需求。

例如，名词能否实现状语化取决于其物性结构是否包含可映射至目标语义类型(如方式、工具)的适配性角色。在“电话联系”中，动词“联系”的语义框架隐含对[+工具]状语的句法需求，触发名词“电话”的功用角色(Telic Role，即“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属性”)被强制激活，从而使其合法化为方式状语(“通过电话”)。这一过程体现了GLT的核心主张：语义生成是语境驱动的动态适配，而非静态词项的组合。

差异，下面将依据不同语义角色展开具体分析。

### 1. 表示方式、方法的普通名词状语跟谓词性成分的语义接口

方式指的是施事者进行动作行为时的形式或方法，会直接参与动作行为。例如：

- (6) 因此，刑法规定，只对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才追究刑事责任。
- (7) 西京大学建校时，一家外地施工队在我店里买肉，每次一百余元，现金交易，付款很干脆，半年多一直如此，逐渐确立了信任关系。
- (8) 部队和群众每逢节假日和农忙季节，共同派出战斗小组，武装保卫边境人民欢度佳节和正常生产。

这些普通名词表示动作行为方式时，不借助格标记引入，直接置于动词性成分前作状语。研究发现，这类表示方式的普通名词多为人造类名词，人造类名词指代的是为满足人们特定需求而制作的事物，所以它们具有明确的使用功能，即功用角色。比如“暴力”是解决问题的，“现金”是用来交易的，“武装”是用于保卫和打仗的等等。这样，现金—交易，暴力—干涉，武装—保卫就必然处于同一个认知框架中。这些普通名词词义结构中本身就蕴含着方式意义。例如：

- 现金：现款。
- 现款：可以当时交付的货币<sup>9)</sup>。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将“现金”释为“现款”，“现款”定义为“可以当时交付的货币”。词典释义中“可以当时交付”凸显了即时性特征。这种“即时交付”的语义特征在状语位置被激活后，能够与谓词性成分的意义实现契合，如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424页。

“现款”与“交易”构成“方式-动作”关系。具有相似语义结构的“现金、现汇、现货、期货、现房、期房”等名词同样也具有状语的用法。例如：

- (9) 有的单位为职工统一办理了银行信用卡，使职工在购买大宗商品时避免了现金结算。
- (10) 我们可以在现货交易的基础上，通过发展远期合约交易，引进期货交易机制，进而最终形成期货交易，使现货交易与期货交易相辅相成。
- (11) 海滨路项目属于一线海景住宅，一期现已现房交付，二期现开始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9300元左右。

在普通名词表示动作行为方式的句法格式中，充当方式状语和普通名词所限制的动词性成分基本上都是其间接功用角色，这些普通名词很容易激活其功用角色，而作为功用角色的动词也很容易激活相应的名词，因此二者组合可能性极高。例如：武装保卫、暴力推翻、现金交易、现货交付、福利分房、集体讨论、协议解决等等。这些普通名词一旦出现在状语的句法位置上，语言组合机制就会迫使普通名词生成方式意义，隐含其指称意义，从而使普通名词做状语在语义上和句法上进行匹配，完成语义和句法的接口。

## 2. 表示依据的普通名词状语跟谓词性成分语义接口

依据是动作行为依从的标准、前提或基础，不直接参与动作行为，是动作行为的外围成分。部分普通名词可以不用格标记引出，直接用在谓词性成分前做状语表示动作行为的依据，形成普通名词做状语的句法形式。例如：

- (12) 常规解决 Buffer Under Run 问题的方法是：扩大缓冲存储器以便存储更多的数据来防止错误的发生。
- (13) 站台排队不加塞，顺序上车不乱挤，礼让他人不抢座。

这些表示依据的普通名词与动作动词之间是如何在语义、句法上互参互

动的，即它们的接口在哪里？

例(12)中，名词“常规”是指“经常实行并解决问题的规定或规则”，当“常规”出现在动作动词“解决”之前的状语位置上，二者在语义上能够互相激活，从而完成句法语义上的接口。例(13)“顺序”，《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将“顺序”释为“次序”，所谓“次序”指的是“动作或事物在空间或时间上排列的先后”。其功能在于事物在空间或时间上的排列，一些动作行为如“上车、前进、购买、进场、退场”等语义结构中均有明确的顺序义，当“顺序”出现在这些谓词性成分前的状语位置上时，二者在语义上能够互相激活，完成句法和语义的接口。

### 3. 表示材料的普通名词状语跟谓词性成分语义接口

材料是施事者施行动作行为所使用或耗费的物质。汉语中大量普通名词可通过语义适配机制充任材料角色，并以状语形式直接前置修饰制作义动词(如“做、写、编”等)，无需借助“用”等格标记介引，且此类结构具有较高的能产性(productivity)，且符合语义类推规则。例如：

- (14) 你看那毛竹做的扁担，多么坚韧，多么结实，再重的担子也能挑得起。
- (15)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 (16)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 (17) 柳条编制出来的筐子特别耐用。

例(14)的“毛竹”、例(15)的“墨”与“血”、例(16)的“水”与“泥”、例(17)的“柳条”均为普通名词，充任状语表示动作行为所消耗的原材料。此类结构中，材料名词与制作义动词构成定中短语(如“毛竹做的”)，修饰表结果的名词性成分(如“扁担”)。根据生成词库理论(GLT)，结果成分(如“扁担”)需具备[+人造实体]特征，其构成材料通过状语名词的构成角色(Constitutive Role)动态映射而来。

此类结构的能产性受以下条件制约：

1. 名词准入限制：名词所指对象在语义框架中可适配为材料角色  
(即具备[+可加工性]特征)
2. 动词语义制约：制作义动词需编码[+原料转化]义素  
(如“糊、砌、编”隐含物态转变过程)

凡满足上述条件的名词，均可通过物性结构适配生成同类句法形式。例如：

纸糊的灯笼 → 纸(材料) → 糊(制作) → 灯笼(结果)

红砖砌的墙 → 红砖(材料) → 砌(制作) → 墙(结果)

研究发现：此类构式的语义格式为“材料+制作动词+的+结果成分”，其合法性源于“材料”、“制作动词”、“结果成分”三者在同一认知框架内的共现。部分动词的词汇语义本身隐含“材料”与“结果”的关联。当材料名词进入“材料+制作义动词+的+结果成分”的格式时，“材料”、“制作动作”和“结果成分”三者语义上能够互相激活，从而完成句法和语义的接口。

#### 4. 表示工具的普通名词状语跟谓词性成分语义接口

工具是施事者施行动作行为时所使用的器具。陈昌来(2003)将工具分为常选工具和偶选工具。常选工具指的是在语义结构中经常跟某一动词搭配的工具；偶选工具指的是在语义结构中偶尔跟某一动词搭配的工具。如“梳头”可以用“梳子”，也可以用“手”，其中“梳子”是常选工具，“手”是偶选工具。研究发现，普通名词做状语表示的工具绝大部分是常选工具，很少是偶选工具<sup>10)</sup>。

10) 如果是偶选工具成分，往往需要借助格标记才能充任状语。例如，“掌声欢迎”中“掌声”作为常选工具，无需介词；而“用掌声掩盖尴尬”中，“掌声”作为偶选工具，则需借助介词“用”，这是因为“掌声”不是“掩盖尴尬”的默认工具。由于偶选工具与动词的语义关联较弱，需要依赖“用、以、通过”等格标记介引才能充任状语，否则会导致句法合法性不足。正是因为偶选工具的语义适配度低，所以需要

如“电话联系”、“掌声欢迎”、“键盘输入”、“红牌罚下”等等。例如：

- (18)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昨晚与美国总统布什电话联系，讨论本地区事态发展。
- (19) 那我们掌声欢迎段先生加盟我们的会议。
- (20) 使用者可以在出席会议时一边手写或键盘输入，一边通过连接在电脑上的话筒录音；将来调阅笔记时，也可以一边听录音一边看笔记。
- (21) 马来西亚队已无还手之力，临近终场前还有一名球员被红牌罚下。

仔细考察这些做状语表示工具的一般名词，可以发现，它们是以人造类名词为主，而人造类名词的主要语义特征是功能角色，即为人们所使用，具有使用功能，使用功能主要用动词来表示。如“电话”是“联系”用的，“掌声”是“欢迎”用的，“键盘”是“输入”用的，“红牌”是足球场上“罚下”队员用的。中心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正是做状语的工具名词的功能角色，名词与其功能角色是在同一个认知域中，密不可分，二者在语义上互相参照，从而实现句法和语义的接口。

### 5. 表示原因的普通名词状语跟谓词性成分语义接口

直接做原因状语的一般名词非常少，能够收集到的只有“煤气、细菌、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少数几个，它们限制的谓词性成分仅限于“中毒、感染”等动词。尽管如此，这种组合也具有充分的语义理据。首先这些一般名词的词义结构中均包含着“有毒，致病”等意义。看《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解释：

- 煤气：① 干馏煤炭等所得的气体，主要成分是氢、甲烷、乙烯、一氧化碳，并有少量的氮、二氧化碳等。无色无味无臭，有毒。用作燃料或化工原料。② 煤不完全燃烧时产生的气体，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无色

---

借助格标记完成句法-语义接口对接。这一现象也印证了生成词库理论(GLT)的预测：句法合法性由语义生成机制动态调控。

无臭,有毒,被人和动物吸入后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引起全身缺氧。

- 细菌:原核生物的一大类,形状有球形、杆形、螺旋形、弧形、线形等,一般都有分裂繁殖。自然界中分布很广,对自然界物质循环起着重大作用。有的细菌对人类有利;有的细菌能使人类、牲畜等发生疾病<sup>11)</sup>。

再看下“中毒、感染”的词义:

- 中毒:指由于毒物进入体内而发生组织破坏、生理机能障碍或死亡。症状是恶心,呕吐,腹泻,头痛,眩晕,呼吸急促,瞳孔异常等。
- 感染:病原体侵入机体,在体内生长繁殖引起病变;受到传染<sup>12)</sup>。

上述动词词义结构中隐含着原因成分,原因成分就是加着重号的部分。如果加着重号语义的普通名词出现在动词前状语位置上,该意义跟动词意义就会形成互动,互相激活,完成语义和句法的接口。

进一步观察会发现,这些普通名词都是人造类名词,它们有着自身的功能角色,使人或动物“中毒”是“煤气”的一个功能,使人或动物“感染”是“细菌”的一个功能,这种功能当属于消极功能。名词和其功能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二者在语义上互相激活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普通名词词义结构中不包含“有毒,致病”等意义,但也可以出现在状语位置上表示原因。如“食物、酒精”。

- 食物:可供食用的物质(多指自然生长的)。
- 酒精:乙醇的通称<sup>13)</sup>。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887页,1408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701页,425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

尽管这些词语的词典释义中不含有“有毒，致病”等意义，但这些普通名词表示的事物在物质世界中可以变质、腐烂或者因使用不当等原因而具有“有毒，致病”等意义，当它们出现在谓词性成分前状语位置上时，就会与动词词义进行互动，激活其“有毒、致病”的消极功能。例如：

- (22) 中国游客在圣彼得堡上海酒店食物中毒。  
(23) 饮酒成了殷代的时尚，尤其是在统治者中，饮酒发展成酗酒而成为公害，殷代的帝王，有的就死于酒精中毒。

## 6. 表示情态的普通名词状语跟谓词性成分语义接口

情态状语一般都表示动作实施者的主观态度。表情态的普通名词做状语时，可以不用格标记引进。例如：

- (24) 这位曾经的平衡木女王激情上演清朝版的平衡木对决。  
(25) 我对员工真情告白，我们确实要拯救这家企业，员工们后来都非常努力，我的深切感受是，只要真心对他们，他们的回馈绝对是成正比的。  
(2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例句(24)–(25)中的普通名词“激情、真情、志愿”的词义结构具有鲜明的评价意义，有些就体现在构成语素中，它们成为名词的构成角色。“激情”的“激”，“真情”的“真”，“诚心”的“诚”等，在词义结构中它们明显体现出描述性特征。例如：

- 激情：强烈激动的感情。
- 深情：深厚的感情。
- 诚心：诚恳的心意。
- 真情：真诚的心情或感情<sup>14)</sup>。

---

印书馆，2016，1188页，698页。

上述词义结构中加着重点的部分就是该词语的评价意义, 评价意义本质上是形容词性的, 而做状语是形容词的重要句法功能之一, 这就为这些名词做状语奠定了很好的语义基础, 当其出现在谓词性成分前的状语位置上时, 语义生成机制会强迫该普通名词激活其评价意义, 使其指称意义退居幕后, 从而实现句法语义的接口。

例句(26)中的“志愿”词义是“志向和愿望”, 这词义解释中似乎没有评价意义, 其实不然, 所谓“志向和愿望”指的是“向往而愿意”, 这就是其评价意义。评价意义是形容词性的, 自然可以作状语。

## 7. 表示范围的普通名词状语跟谓词性成分语义接口

普通名词做状语能够表示动作行为的范围, 名词词义起了决定性作用。仔细考察会发现: 很多这类名词的构词语素中有一个表示范围的语素“全”, 它成为这类普通名词的构成角色。如“全程、全文、全景、全线、全票、全民、全力、全球、全权、全速、全员、全方位”等, 这些词的词义结构中都具有范围语义特征。例如:

- 全程: 全部路程。
- 全力: 全部的力量或精力。
- 全员: 全体职工; 全体成员<sup>15)</sup>。

这些普通名词的词义结构中义素“全部”跟范围副词“全”和“都”的意义相同, 范围副词能够自由地做动词的状语, 而这些具有范围义语素的普通名词一旦出现在谓词性成分前面状语位置上, 其词义结构中的范围义就会被激活, 从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160页, 606页, 1663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082页, 1083页, 1084页。

而实现语义跟句法的接口。此类作状语的一般名词有“大规模、全方位、多角度、大范围、小范围、大幅度、小幅度、大面积、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宽领域”等。看下面的例句：

- (27) 建立公司培训中心, 提高公司本部教育培训能力, 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全方位培训各类人才。
- (28) 他们选择出了新银合欢、山毛豆、直干兰等3个树种, 在全县大范围推广, 效果十分理想。

例(27)的“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全方位”, 例(28)的“大范围”等都是具有范围意义的名词短语, 在句子均实现为状语。这类短语中的范围意义形成了这类短语的构成角色, 进而成为这些短语做状语的语义和句法接口。

通过分析, 做状语的一般名词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人工类名词, 一类是性状义名词。人工类名词的语义结构中存在着跟其中心语搭配的语义基础, 也就是这类名词的功用角色, 而这些功用角色正是中心语谓词性成分表达的动作行为, 当这些名词出现在谓词性成分前充当状语时, 不通过格标记也可以激活其方式、工具、材料、依据、原因等语义角色, 因为这些语义角色和其功能角色处于同一个认知框架内, 表达功用角色的谓词性成分能够唤醒相应的语义角色。性状义名词主要是通过该类名词的构成角色实现句法和语义接口。

性状义名词有两类: 一类是其词义结构中含有评价意义, 这些评价意义成为这类名词的构成角色。作为构成角色的评价意义本质上是形容词性的, 而做状语是形容词的重要句法功能之一, 这就为这些名词做状语奠定了很好的语义基础, 当其出现在谓词性成分前的状语位置上时, 语义生成机制会强迫该一般名词激活其评价意义, 使其指称意义退居幕后, 从而实现句法语义的接口, 这类一般名词也能够像形容词那样, 可后附状语标志“地”。另一类是名词的构词语素包含一个表示范围的语素, 它成为这类一般名词的构成角色, 而这些一般名词一旦出现在谓词性成分前面状语位置上, 其词义结构中的范围义

就会被激活,从而实现语义跟句法的接口。

#### IV. 普通名词作状语的制约因素

一般来说,状语不属于句子的论元成分,并非必须与动词同现的强制性成分,其在表层句法结构中的隐现具有自由性——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例如:

- (29) 在列日、安特卫普等城市,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用暴力]冲散示威的工人,并且殴打火车站的工人纠察队。  
 (29') 在列日、安特卫普等城市,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冲散示威的工人,并且殴打火车站的工人纠察队。  
 (30) 如心小心翼翼地把盒子[用报纸]包起来,放进手挽袋里,携往市区。  
 (30') 如心小心翼翼地把盒子包起来,放进手挽袋里,携往市区。  
 (31) 9.23 下午外出开会,有事[手机]联系。  
 (31') 9.23 下午外出开会,有事联系。

上述例句中,状语成分删除后,句子仍能成立。由此引发问题:状语成分在表层句法结构中隐现的依据是什么?为何有时可以不出现,有时却需要出现?普通名词做状语时无需格标记引进,在句法上是否具有特殊的要求?

在现代汉语中,状语可以表示方式、工具、材料、依据、原因、情态、范围、时间、地点等多种语义角色。除了情态和时间外,其他语义角色大都要通过格标记引进。普通名词做状语虽然无需格标记引进,但很多情况下是可以添加上相应的格标记的,因此,有无格标记引进的普通名词做状语,其句法语义功能是相同的。

陈昌来(2003)对《王朔文集》和张炜小说《古船》大约 210 万字的语料进行了统计,发现只有 500 条语句含有工具成分,与应该出现工具的动作句

子比起来，工具状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究其原因，陈昌来(2003)做了非常好的解释：“工具跟动作有直接的依存关系，因而动作的工具作为语义成分实际上也就蕴含在该动词的词义内部，或者说工具是某些动词词义的一部分，是动词词义所固有的。”“由于工具跟动作(动词)有直接的联系，在具体使用中，人们会根据经验把动作和工具置于同一个认知框架，即在心理上构成同一个‘完形结构’或‘理想认知模型’，由于动作在认知上‘显著度’明显高于工具，所以人们在认知动作的同时就附带认知了工具。”，“从而使工具成分成为冗余成分而在实际话语中被缺省<sup>16)</sup>。”据调查，诸如方式、材料、依据等状语出现频率也不高，其原因应该跟工具大致相同。陈昌来(2003)将状语的出现与否归结于受语义加细原则和语用凸显原则的制约。所谓语义加细原则指的是这些状语“显现的目的是使句子语义更加明确、准确、细腻”。所谓语用凸显原则指的是表达者是为了强调、突出状语成分特别的表达功能。

研究发现，普通名词作状语时不仅受语义加细原则和语用凸出原则的制约，也受语音节律因素的影响。

### 1. 语义加细原则

普通名词做状语主要受语义加细原则的制约。从状语与中心语的关系来看，充当状语语义角色的名词所指称的事物对动词来讲不是唯一可选的，往往有多种选择。如果普通名词状语不在表层句法结构中出现，表达者就无法表达出具体哪种事物充当语义角色，听读者也难以知晓，导致语义表达概略而不细致。比较下面的例句：

(32) 1月 11日，兰州部队党委又做出一项决定，严肃处理部分师以上干部利用职权[低价]购买 40 辆摩托车的问题。

(32) 1月 11日，兰州部队党委又做出一项决定，严肃处理部分师以上干部利用职权购买 40 辆摩托车的问题。

16) 陈昌来，《现代汉语语义平面问题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187-190页。

比较(32)和(32)可以发现,两个句子都是合格的。尽管如此,动词“购买”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有“低价”,“高价”,“出厂价”,“跳楼价”等多种方式。例(32)有普通名词状语“低价”,使中心语动词“购买”的语义表述更加精细;而例(32)没有普通名词状语,听读者无从知道“购买”的具体方式,动词“购买”的语义表述相对宽泛,不够精细。

## 2. 语用凸显原则

部分以有标记形式出现的状语成分,其语义角色本是动词的常用、典型甚至唯一关联的语义角色。这些语义角色已蕴含在动词语义结构中,一般情况下不在表层句法结构的状语位置上出现。例如:

(33) 庞气恼之下,说:“拿去给我炸了吃!”

(34) 周华站在敞开的窗前梳头,头发很长时间没整了,需用卡子才能使它利索一些。

上述例句中,动词的语义结构中蕴含着材料、工具等语义角色,比如例(33)的“炸”蕴含着材料角色“油”,例(34)的“梳”蕴含着工具角色“梳子”,它们是动词所表动作行为的常用、一般甚至是唯一的语义角色,动词的语义完全能够激活这些语义角色,因此,尽管它们不在表层句法结构的状语位置上出现,也不影响语义的理解。但是在实际的语料中,会发现这类语义角色出现在表层句法结构的状语位置上。例如:

(35) 食堂里常常用花生做菜,她就用油炸了再撒上焦盐给年轻人吃,煮烂了给小娃娃们吃,还春些花生粉,给嚼不动花生的老年人吃。

(36) 阿英用梳子梳着头发,踌躇地说,“讲起来,可长哩。”

上述例句中的材料角色“油”和工具角色“梳子”均出现在表层句法结构的

状语位置上，其实这些语义角色即使不出现，也不会影响句子语义的理解，即表层句法结构中不出现这些语义角色，句子意义的表达基本相同。它们之所以出现，其原因就在于凸显这些材料和工具成分。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明示成分比蕴含成分更易强化信息刺激，加深语言感知。这种默认语义角色从“隐含”转为“显性”的现象，体现了语用层面通过句法手段调控信息焦点的机制。

语用凸显原则通过将默认语义角色显性化，实现了信息焦点的动态调控。此类语言现象印证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主张：句法并非自足系统，而是概念化过程与交际策略的外显形式。

### 3. 语音节律制约

做状语的一般名词和被其限制的动词往往都是双音节的，二者形成“2 + 2”的语音节律形式。例如：“电话联系、低价倾销、高价购买、低息贷款、志愿加入、真情奉献、食物中毒、全文播送、全程监督、意气用事、冷眼相对、恶语相加”等。状语与中心语之间的搭配相对比较稳定，具有成语化的倾向，有些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已经作为固定词条列出，如“意气用事”等。现代汉语节律的基本音步是双音节，“2 + 2”是一种稳定的节律形式<sup>17)</sup>，因此，这种结构形式有固定化的趋势。

有些普通名词做状语就是语音节律催化的结果。例如：

- (37) 就算只有三两个人等车，只要地形容许，他们也会自觉地排成一行，早晨上班高峰时，有的队伍排到百米开外。车来了，大家按顺序上车。
- (38) 无人售票就是要建立一种顺序上车，主动投币，互相监督，自我参与，自我管理的新习惯。

例(37)的普通名词“顺序”做状语以介词“按”引进，采用了有标记形式；例

17) 冯胜利，〈论汉语的“自然音步”〉，《中国语文》第1期，1998。

(38)的“顺序”直接做状语,采用了无标记形式,制约其采用无标记形式的动因是为了与下面的“主动投币,互相监督,自我参与,自我管理”四个短语的节律一致起来;如果采用有标记形式,就会造成与下文四个短语节律形式的不一致,从而破坏语用上的节律美。

在现代汉语中,典型名词以双音节为主,典型动词以单音节为主<sup>18)</sup>,如果状语名词是双音节的,则中心语动词往往也要选择双音节的,或凑成双音节形式。例如:“大声读”就不如“大声朗读”好;“低价买”就不如“低价买进”好;“掌声请”不成立,“掌声有请”才成立。三音节的状中形式往往要以对举的形式出现才能成立。例如:

(39) 他们低价买,高价卖,分散出售手表50块,从中非法牟利。

例(39)的“低价买”和“高价卖”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它们采用了对句形式,即“3 + 3”,这也符合汉语的语音节律。如果单独使用“低价买”或“高价卖”,往往要采用“2 + 2”的形式,即凑成“2 + 2”的形式。例如:

(40) 郑黑眼啊黑心狼,他就高利放债,低价买地。

(41) 不过她了解这是有用的商品,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时尚如此嘛。

例(40)的“低价买地”,例(41)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都是“2 + 2”形式。调查了CCL语料库现代汉语部分中当代的报刊部分,搜索“低价买”和“高价卖”,其中“低价买”共得到74个例句,当中72个组成了“2 + 2”形式,有的是“买”带单音节宾语,如例(40)的“买地”,更多的是带趋向补语或体标记,主要有“买进、买来、买到、买回、买了”;“高价卖”共得到69个例句,其有66个组成了“2 + 2”形式,“卖”或者带单音节宾语,或组成动补结构或带体标记,如

18) 刘丹青,〈词类和词长的相关性——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1996。

“卖出、卖掉、卖给，卖了”等。可见，语音节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普通名词做状语。

需要指出的是，也有一些语义类型的名词状语不受语音节律的制约。如材料角色的名词状语跟语音节律没有关系，如“纸糊的灯笼、红砖砌的墙、樟木做的箱子、毛线打的毛衣、麦秸编的工艺品”等等。

另外，也有少数三音节名词可以直接做状语，它们大部分采用“大、小、高、低”等形容词前缀与一个双音节名词组合成词修饰限制后面的动词形容词。比如“大面积推广、大规模改造、大幅度提高、小面积耕种、小范围进行、小角度射门、高频率振动”等等。

状语作为句子中非强制性成分，其在句法结构中的显隐具有自由性。但这种自由性受语义、语用及语音节律的多重制约。

语义加细原则是核心制约因素。当动词的语义角色(如方式、工具、依据等)存在多种可能性时，普通名词状语的出现能细化语义表达。例如，“购买”可搭配“低价”或“高价”等不同方式，状语“低价”的存在使动作方式具体化，避免语义模糊。

语用凸显原则通过显性化默认语义角色实现信息焦点调控。即使动词隐含典型语义角色(如“炸”隐含“油”)，状语仍可能出现以强调特定成分(如“用油炸”)，通过句法手段强化信息刺激。说话者往往通过强化特定语义角色，来实现交际意图的凸显。

语音节律制约影响状语形式的选择。现代汉语以双音节为基本音步，普通名词状语与动词长构成“2+2”稳定结构(如“电话联系”)，不分短语因节律需要形成固定搭配(如“意气用事”)。三音节状中结构大部分需要对举(如“低价买，高价卖”)，或者通过添加补语凑成双音节(如“低价买进”)，但材质类状语(如“纸糊的灯笼)及带前缀的三音节状语(如“大面积推广”)不受此限制。

总而言之，普通名词作状语的隐现是由语义精确性、语用强调需求，以及语音节律的共同决定，体现了汉语句法在语义、语用以及韵律层面的交互作用。

## V. 结语

名词做状语不是普通名词的范畴功能,属于非范畴化用法。做状语的普通名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造类名词,一类是性状义名词。人造类名词在谓词性成分前充当状语时,不通过格标记也可以激活其方式、工具、材料、依据、原因等语义角色,因为这些语义角色和其功能角色处于同一个认知框架内,表达功用角色的谓词性成分能够唤醒相应的语义角色。性状义名词具有的评价意义本质上是形容词性的,而做状语是形容词的重要句法功能之一,这就为具有评价意义的性状义名词做状语奠定了很好的语义基础。

一般来说,状语不是句子的论元成分,在句子表层句法结构中的隐现具有自由性,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带格标记的状语性成分主要受语义加细原则和语用凸显原则的制约,而普通名词做状语主要受语义加细原则和语音节律原则的制约,一般不受语用凸显原则的制约。

现代汉语普通名词作状语的语言现象研究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语法系统的局限性,为汉语名词非范畴化特征提供实证支持,同时可补充生成词库理论与认知语法在句法语义互动中的解释框架。

### <参考文献>

- 陈昌来,《现代汉语语义平面问题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范晓,《三维语法阐释》,《汉语学习》第6期,2004.  
冯胜利,《论汉语的“自然音步”》,《中国语文》第1期,1998.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六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李晋荃,《试谈非时地名词充当状语》,《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1983.

- 刘丹青,〈词类和词长的相关性——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1996.
- 刘慧清,〈名词作状语及其相关特征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2005.
-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苗艳艳,《非时地名词作状语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 沈家煊,《现代汉语语法的功能、语用、认知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宋婧渊,《先当代汉语名词作状语的历时考察》,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孙德金,〈现代汉语名词作状语的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1995.
- 王小溪,〈现代汉语非时地名词作状语微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2003.
- 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张秀送、张爱玲,〈生成词库理论简介〉,《当代语言学》第3期,2009.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朱德熙,《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Kortmann, B., *Adverbial Subordination: A Typology and History of Adverbial Subordination Based on European Languages: Mouton de Gruyter*, 1997.
- Langacker, R. W., *Essentials of cognitive gramm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Mark Liberman, & Alan Prince. "On stress and linguistic rhythm", *Linguistic inquiry*, 8.2, (1977).
- Puatejovsky, J., Generativity and explanation in semantics: A reply to Fodor and Lepore, *Linguistic Inquiry*, 29.2, (1998).

## &lt; Abstract &g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dverbialization of common nouns in Mandarin Chinese, revealing its cognitive mechanisms and syntactic realization. The study identifies dual cognitive motivations: (1) Artificially constructed nouns (e.g., “优惠价销售” [sell at discounted price]) activate implicit semantic roles (e.g., instrument/manner) via functional alignment with verbs without morphological markers; (2) Qualitative nouns (e.g., “深情诉说” [speak with emotion], “全程跟踪” [track throughout]) achieve syntactic compatibility through inherent evaluative features or scope morphemes (“全” [full]). These constructions follow two constraints: semantic specification ensuring precise action parameterization (material/basis) and phonological rhythm favoring disyllabic “2+2” structures (e.g., “电话联系” [contact by phone]). Non-conforming cases rely on parallelism (e.g., “南征北战” [fight north/south]) or syllable adjustment. Compared to case-marked adverbials, noun adverbialization emphasizes interaction between semantic integration and prosodic optimization. By constructing a cognitive framework-semantic role-syntactic realization triad, this research explicates dynamic noun decategorization mechanisms, offering a novel paradigm for studying Chinese grammatical flexibility and typological comparisons.

**Key Words** : 普通名词状语化(Noun Adverbialization), 双重认知理据  
(Cognitive Mechanisms), 语义加细原则(Semantic  
Specification), 语音节律(Phonological Rhythm),  
句法语义接口(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